

中国共产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考察

彭正德，罗绍松

摘要：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多年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程，可以分为初步探索、逐步畸变、恢复发展和继续深化四个历史阶段，相应地，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措施凸显了注重民主团结、扩大敌我矛盾、强调民主法制、突出社会稳定四大特征。认真回顾这一历程并总结相关经验教训，对于防范和化解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民内部矛盾；历史考察

作者简介：彭正德，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罗绍松，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广西 南宁 410081）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矛盾高发而激烈的历史时期，有的社会矛盾甚至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出现，对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些社会矛盾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存在的摩擦、冲突和不协调的一种社会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从执掌全国政权之日起，就面临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重任，认真梳理和反思 60 多年来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对于我们党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内学界从史学角度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和梳理中国共产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演变，只有极少数研究成果探讨了党和国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然而，只有在实践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总结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经验。本文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进行历史考察。

一、初步探索：注重民主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的八年中，尽管我们党面临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构建新的政治秩序和消灭剥削制度的重大任务，但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开始出现并呈现出扩大之势，特别是 1956 年 9 月到 1957 年 3 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的事件^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党的面前。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物质匮乏与人民群众的需要之间的矛盾、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工厂和农村中的公私矛盾、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准备条件，党采取了正确措施来处理这些矛盾。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正确处理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矛盾与巩固党的执政安全研究”（11AKS004）；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0ZDB46）

1. 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党接管全国政权时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烂摊子,物质资料极度匮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党只有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能缓解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与物质资料匮乏之间的矛盾,并为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创造条件。

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②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强调要“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善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通过土地改革,党将全国约7亿亩土地、生产工具和粮食分给了约3亿农民,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至70%,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后,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主要是依靠国营经济,党将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改造为国营企业后,及时实施企业管理的民主改革,使广大工人翻身成了企业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党和人民的努力下,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③,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城市职工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在此基础上,党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力推动经济发展。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极大地缓解了物质匮乏与人民群众需要之间的矛盾,也为解决其他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 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和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执政环境下如何进行经济和国家建设,对党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需要广大党员加强学习,增强自身素质,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然而,党中央发现,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相当严重,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滋长,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特别突出,贪污腐化的行为增多,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群众对我们党不满的情绪”^④,使人民群众与领导机关之间的矛盾得以凸显。因此,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及时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

1949年11月,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党设立了地方、军队和中央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党内的纪律监督。1950年4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在报纸刊物上对这些缺点和错误展开自我批评,党中央认为:“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⑤在此基础上,党中央领导和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整风整党运动,以整顿党员特别是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在1951年2月到1954年春的整党运动中,就有23.8万人被清除出党,9万多人自愿或被劝退党。^⑥

通过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和作风,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居功自傲思想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地缓解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3. 开展思想教育和利益协调

这一时期,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是引起人民内部利益关系发生巨大变动的两件大事。“三大改造”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制度的重塑,它使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即公私矛盾得以凸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需要广大农民做出贡献和牺牲,必然会引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利益关系的调整也带来了

各阶级、群体内部的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领导机关之间的矛盾。党在处理上述矛盾时特别强调思想教育和利益协调。

思想教育的方法在“三大改造”中被普遍运用。党的领导人认为,思想教育是民主的方法,对待人民就是要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改造,而不能用强迫的和专政的方法。通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和有效的利益协调,党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三大改造”过程中的公私矛盾、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及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也使党的工业化战略取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八年中,党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凸显了“发扬民主、维护团结”的主题。党之所以能够在这一主题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党在执政初期面临着复杂的斗争环境,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新中国初期,敌我矛盾十分突出,党既要消除国内外反动力量的军事威胁,又要化解国内经济领域的风险以维持经济秩序,还要消灭剥削制度、构建新的政治秩序,党必须通过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凝聚革命力量,才能巩固新生政权。

第二,党对人民内部矛盾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和判断。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针对国营工厂中出现的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指出,国营工厂内部的基本矛盾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进而把社会矛盾划分为“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和“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两大类。后来,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做了更深刻的论述,并把1956年下半年发生的罢工、罢课、退社等事件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

第三,党确立了以民主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原则。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中认识到,必须按照“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原则,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的态度和手段。毛泽东认为,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农民罢社的“少数人闹事”问题,直接原因是人民群众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是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造成的,因此“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⑦

总体来看,由于科学认识并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党成功地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开创了民主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正确认识发生了动摇和偏移,这一变化在党的领导人毛泽东1957年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就得到了反映。

二、逐步畸变:扩大敌我矛盾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民内部矛盾取代敌我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如党的领导人所认识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应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党在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逐步“左”倾,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时期,党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许多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1. 变革生产关系和以革命促生产

在这一时期,党不是注重通过发展生产力而是强调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和开展政治、思想革命来推动经济发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反右斗争造成的紧张气氛中,经济建设上的“左”倾思想进一步膨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与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相比,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

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经济上的大跃进直接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阶级话语指导下,政治思想革命得到突出,经济发展被置于次要地位,“抓革命,促生产”逐渐成为各行业响亮的口号。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号召:“我们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要紧紧抓住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个环子,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1月10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大力推进和落实“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强调革命和生产两手抓、两不误,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方针真正强调的重心是革命,因此未很好地推动生产的发展。

变革生产关系和以革命促生产的做法由于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并使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也就无法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措施,相反,它使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

2. 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和开展群众性运动批斗

这一时期,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以“阶级”为核心开展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从1957年开始,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陆续开展,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得到强化。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行动取向的信念体系,一种指导和激发政治行为的综合性的思想观念”,发挥着“使某种行为和安排合法化”和“使人们在某种目标下凝聚和团结起来”的重要作用。^⑨在意识形态的说服、教育功能及其传递的政治压力的作用下,个人同国家和集体之间、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两大阶级内部的利益矛盾,以及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等思想矛盾,都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前提下得以“解决”。

与意识形态强化相伴随的,是群众性运动批斗。“左”的意识形态缩小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将许多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分歧、利益冲突推向敌我矛盾的圈子,而处理敌我矛盾必须采取强制、斗争的方法。从1957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群众性运动批斗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被普遍使用,甚至“凡是人民内部矛盾统统看成是阶级斗争,一提阶级斗争就是敌我矛盾,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同志当作敌人来斗,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⑩

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到文化大革命的这段时期,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之所以会发生严重失误,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做了错误的判断。党的八大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求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之间的矛盾,但是受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这一正确论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遭到质疑,并被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否定,而同时,阶级斗争扩大化获得了合法性。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斗私批修等政治运动没有照顾好群众的个人利益需求,并对经济建设造成了冲击和破坏,从而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引起了干部和群众的质疑和不满,这些质疑和不满反过来又推动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使党对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得以继续。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虽然确立了,但是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水平比较低。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运作是否规范、政治生活是否有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化水平。“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⑪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我国政治生活特别是政治权力运作尚未有效实现制度化,而党作为政治制度的缔造者,容易改变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规则和程序,受长期革命斗争的影响,党内的权力分配和运作又以党的领袖为核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党的领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认识容易成为党的主张并进入国家

政策层面。

三、恢复发展：强调民主法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1979年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议恢复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⑩从思想、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党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和发展。总体来看，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党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突出强调民主与法制。

1.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党认识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这一矛盾在各方面的表现，因此，通过生产关系改革推动生产力发展成为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措施。

改革从农村开始。面对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改革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体制的要求，从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开始，党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鼓励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党中央连续颁布了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五个“一号文件”，不仅稳定和完善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从1984年起，改革的重点逐步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不断扩大国营企业的自主权，保护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实施经济体制改革。

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改革实质上是一个扩大经济民主的过程，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1976年相比，1989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8739亿元，农业总产值的增长超过了3084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6年的316元增长到1989年的1512元。生产关系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缓解了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为解决其他人民内部矛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

2.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在清理“左”倾错误思想的过程中，党恢复了用民主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在实践中体现出两大新特点：一方面，民主方法的运用不再停留于“说服”和“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层面，而是强调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民主方法的运用与法制方法相结合并以法制为保障，从而使民主和法制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一大后，党中央就着手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扩大党内民主。在党内民主的推动下，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得到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导制定了《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和保障了人民民主。二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将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制度化，使多党合作制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三是领导制定了《国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推动了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民主是一种矛盾协调机制。无论是作为国家上层的决策方式，还是作为社会基层的管理手段，民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化解共同体内部的利益争端和冲突，实现社会和谐。

与国家整合,因为“民主不仅通过发挥参与者承担某种义务来鼓励和平解决争端,而且创造一种使诉诸暴力以达到目的成为不必要的和战略上不明智的局面。”^⑧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为人们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缓和与化解。

3. 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文革”结束后,基于对夸大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错误的反思,中国共产党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作用,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1981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卫生部、公安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随后,一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全国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1983年,全国农村根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开展了建设文明村镇等工作。1986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作了深刻论述和全面部署。

精神文明建设强调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教育,对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增强了社会的思想认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和谐了人际关系,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并且引导人民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认同党的方针和政策,从而有效地缓和了人民内部矛盾。二是推动了党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反映在党内,就是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党的领导人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党风。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三是促进了民主和法制手段的运用。民主和法制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的结束和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变化,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方法得以恢复,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党运用经济、民主、法制、思想等多种手段,有效地缓解了人民内部矛盾,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但是,改革和发展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变动和新的社会问题,使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激烈化的态势,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就得到了反映。

四、继续深化:突出社会稳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民主和法制建设稳步推进,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却日趋复杂和尖锐,并且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一,矛盾具有易发性和多发性。正如胡锦涛所说:“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难以避免地会经常地大量地表现出来。”^⑩其二,城乡矛盾、阶层矛盾、干群矛盾相对突出,这些矛盾相互交织,甚至形成“仇官”和“仇富”现象。其三,矛盾的表现形式出现群体化趋势,甚至许多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众也被卷入进来。其四,矛盾的对抗性增强,特别是在群体性事件中,矛盾的对抗性迅速升级。面对人民内部矛盾逐渐复杂和尖锐的态势,党突出强调维护社会稳定,一方面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努力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措施,这种创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协调重大矛盾关系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矛盾关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事关全局的突出问题,直接制约着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有的本身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深厚土壤和重要诱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协调和处理好这些重大矛盾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些重大矛盾关系逐渐凸显,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将这些重大矛盾关系概括为“十二大关系”。

尽管重大矛盾关系的协调难度很大,党仍然坚持推进这一工作,特别是在协调城乡关系和区域关系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在协调城乡关系方面,党采取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领导实施了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开始从体制上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缓解了城乡矛盾和农民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协调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关系方面,自2000年以来,党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先后领导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努力推动地区协调发展,为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和缓解地区矛盾、民族矛盾、阶层矛盾、干群矛盾等做出了积极贡献。

2. 改善党群、干群关系

这一时期,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为党群、干群矛盾或者说领导者同人民群众的矛盾,甚至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涉及了这一矛盾。其主要原因,一方面,社会的民主意识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期望升高,他们希望党和政府满足其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贪污腐化,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对于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90年春,党中央就指出,党员干部中滋长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有的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⑩

改善党群和干群关系的工作主要围绕“从严治党”而展开,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展党性党风教育。除党内常规性思想教育外,党还集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目的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二是建立和完善廉政法规制度。这一时期,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建立健全了党内廉政制度,促使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严厉惩处腐败行为。这一时期,党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空前加强,大批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因贪污腐败问题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党解决了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缓和、减少了领导者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并推动了其他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

3.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并日趋激烈,反映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和方式存在诸多弊端,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为此,党强调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会上强调要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同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了研究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央于2011年2月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在2011年5月底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顺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2011年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并开始履行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职能。在中央的推动下,地方政府积极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许多地方政府还制定了社会管理创新实施方案,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创新强调“服务”与“和谐”的理念,对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社会管理工作得到了较大改进,

对于缓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结 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任务和新的课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维护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因而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在 60 多年的执政时间里,积极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并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和发展调整应对措施,有过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程表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并在大力发展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着力协调好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关系和领导机关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当前,我国社会过大的贫富差距和较严重的权力腐败问题已成为诱发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社会公正和权力廉洁,便成为防范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

注 释:

-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569页。
-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2页。
- ③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52页。
- ④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0页,第191页。
- ⑥夏元珍:《论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党史文苑》2007年第5期。
- ⑦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4页。
-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28页。
- ⑨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 ⑩于哲士:《阶级斗争与人民内部矛盾》,《学术研究辑刊》1979年。
- ⑪(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 ⑫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第146-147页。
- ⑬(美)科恩:《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28页。
- 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6页。
- ⑮人民日报,2010年9月30日。
- ⑯《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473页。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by CPC

PENG Zheng-de, LUO Shao-song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people by CPC in more than 60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ur stages of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gradual distortion,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ontinual deepening. Accordingly, the measures taken by CPC are characterized by valuing democracy and unity, expand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our people and the enemies, emphasizing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highlighting social stability. Reviewing the history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seriously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guard against and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ey words: CPC; the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peopl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责任编辑:文 一)